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1, No. 2, 2025, pp.201-210.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2.03>



古尔纳《遗弃》中的爱之事件

郝文萱 (Hao Wenxuan)

摘要: 阿兰·巴迪欧将爱与政治、科学、艺术视作真理的四个前提。爱促生的革命性合体最终产生了一个不能被既往知识体系所识别和处置的不可辨识的集合，最终导向了真正的断裂性的事件。本文借助巴迪欧的爱之事件理论，以古尔纳小说《遗弃》中蕾哈娜与皮尔斯具有颠覆性的爱之事件为核心，围绕事件本身以及拉希德对其想象的断裂，论述了爱之事件是如何以其建构和生成着的生命，颠覆社会大写的一的逻辑，并在忠实于爱的原则上，创造出新的世界的过程。

关键词: 古尔纳;《遗弃》;巴迪欧;事件;创基性

作者简介: 郝文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英美文学。电子邮箱：selene20000@126.com。

Title: Love Events in Gurnah's *Desertion*

Abstract: Alain Badiou regards love, together with politics, science and art, as the four premises of truth. The revolutionary ensemble that love promotes ultimately produces an unrecognisable collection that cannot be identified and disposed of by previous systems of knowledge and ultimately leads to a truly ruptural event. Drawing on Badiou's theory of the event of love, this paper centres on the subversive event of love between Rehana and Pearce in Gurnah's novel *Desertion* and the rupture of Rashid's imagination of it, discusses how the event of love, with its constructed and generative life, subverts the logic of the One and creates a new world in fidelity to the principle of love.

Keywords: Gurnah; *Desertion*; Badiou; Event; Inceptuality

Author Biography: Hao Wenxuan,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selene20000@126.com.

一、引言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在《爱的多重奏》（*Eloge de L'amour*, 2009）中区分了有关爱的三个观念，分别是基于相遇时的喜悦的浪漫主义观念，一种商业的契约，以及认为爱不过是幻影的怀疑主义观念。紧接着他提出了自己对爱的洞见：“……爱不可以被归结为上述的任何一种观念，爱是一种真理的建构。”（巴迪欧, 2012, p. 53）巴迪欧的“真理”是一种特别意义上的真理，即“当他从‘两’而不是从‘一’出发来体验世界时，所体验的世界是怎样的？从差异性而不是从同一性出发时，人们所体验到的、所实践的和生活着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他将这种从差异性出发来建构世界的爱与列维纳斯“爱是一种他异性的经验”做了区分，认为在爱之中谈不上有什么特别“伦理”的东西。与他人的相遇还不是一种经验，而是一个晦暗不明的，只有在实在世界内部的多种形式的后果中才能取得其现实性的事件。古尔纳的小说《遗弃》（*Desertion*, 2005）中就叙述了这样一个爱之事件：在十九世纪末期的英属殖民地肯尼亚，英国人马丁·皮尔斯（Martin Pearce）与救起他的穆斯林青年哈桑纳利（Hassanali）的姐姐蕾哈娜（Rehana）一见钟情，最终不顾殖民和宗教的限制走到了一起。这一爱之事件在多年后不仅影响了贾米拉（Jamila）（蕾哈娜的外孙女）与阿明（Amin）的爱情，同样对将这一事件作为研究对象的后殖民学者拉希德（Rashid，阿明的弟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获得开始与芭芭拉爱情的勇气。蕾哈娜和皮尔斯的相遇是巴迪欧意义上的具有革命性的爱之事件，它以其创基性的方式奠定了一种全新的逻辑，其合体的主体不断用内在的真实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里实现了对各种再现的绝对溢出，使全新的生活通过爱的邂逅降临。

二、拉希德：受挫的想象与大写的一

《遗弃》的第一部分由四个小节和一个“插叙”构成。前四个小节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分别聚焦四个不同人物（哈桑纳利、弗雷德里克、蕾哈娜、皮尔斯）对十九世纪末肯尼亚殖民地的生活进行了叙述，以英国人皮尔斯如何获救以及与蕾哈娜相遇作为主线。第四小节在伤愈的皮尔斯重返哈桑纳利和蕾哈娜姐弟家做客时戛然而止，并没有展开对两人爱情如何开始以及发展的叙述。从接下来的“插叙”中可以得知，前四小节的执笔人正是后殖民学者拉希德。之所以就此搁笔，是因为他在对两人爱情故事的追溯中发现：尽管他可以在“知识非常不全面的情况下”想象其他事情，但他对于马丁和蕾哈娜这件事“根本无从确定一个看似最有可能的事件的发展顺序。”对于两人的爱情，他“尽管知道它确实发生了，但他对此无法想象。”（古尔纳, 2023, p. 128）既然不是知识不全面造成的，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拉希德想象的断裂？

巴迪欧在《萨科齐代表着什么》中剖析了法国在萨科齐当选时盛行的贝当主义^①并深刻地指出“把人民中的一部分区分出来，加以排斥，或者在法国人和非法国人之间划一道界限，这是荒谬而且不人道的。”（巴迪欧, 2012, p. 20）柏林墙倒下了，然而，更多的隔离墙却建立起来了。移民问题不仅仅是法国的问题，而是整个西方的问题。除了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将人们隔离起来的往往

^① 贝当主义（petainism），来自菲利普·贝当，二战时期为与纳粹德国合作的维希政府头目。贝当主义泛指将一小部分人民指定为罪恶源头并对他们进行监视、控制、驱逐甚至杀害的行为。

是观念与偏见。拉希德笔下的肯尼亚殖民地，体现了这种偏见的历史根源。小说中的伯顿和弗雷德里克都是当地的官员，虽然弗雷德里克相比于崇尚暴力统治的伯顿更加温和，但他依旧代表着文化帝国主义式的傲慢。在弗雷德里克去哈桑纳利那里企图带走受伤昏迷的皮尔斯时，来帮忙的当地居民瓦基尔的镇定自若与有条不紊使他震惊。由于瓦基尔说阿拉伯语，弗雷德里克一句也听不懂，但他还是“成功地做到了让（瓦基尔的）每句话都听起来是那么工于心计和狡猾奸诈。”（古尔纳, 2023, p. 48）除了毫无来由的恶意，弗雷德里克的傲慢还使他无法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这些人一点力气也不愿意出，都是奴隶制的恶果……他们在被奴役时学会了偷奸耍滑，如今已经不知道努力或责任感为何物了。”（古尔纳, 2023, p.52）弗雷德里克所代表的官员毫无自省意识，即使认识到了奴隶制的后果，却对身为始作俑者的自己毫无反省之意。

1807 年，英国颁布奴隶贸易禁令，虽然废奴主义者受到了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影响，但废奴运动背后的动机却绝不仅仅是人道主义这样简单。特立尼达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在 1944 年提出了经济解释，即“新兴工业使种植园经济的利润大幅降低，只有奴隶贸易在整体上停止或者锐减，英国制造商和商人才有望在与非洲的其他贸易上获得可观的利润。”（希尔顿, 2021, p. 262）而臭名昭著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也是如此，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以“造成巨大破坏的方式攫取了大量非洲土地与资源，其征召的被迫长途搬运重物的脚夫死亡率尤其高。”（霍赫希尔德, 2018, p. 157）与小说中伯顿和弗雷德里克所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一样，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废奴主义，其背后不变的是不可一世的傲慢与对非洲本土人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蔑视。这种偏见使欧非两种文化之间产生巨大隔阂，而瓜分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的行动甚至加深了本土不同部落之间的冲突，造成非洲内部的分裂。与伯顿与弗雷德里克不同的是，马丁·皮尔斯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慢慢就会发现，自己在这些地方做的事情，其实没有多少英雄主义色彩”，除此之外他还认为“我们是有所亏欠的……因为我们侵犯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古尔纳, 2023, p. 99）在弗雷德里克引用奥斯卡·王尔德的时候，皮尔斯“惊呼着大笑起来”，以反讽的方式表达了对其傲慢的抨击。

除此之外，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也有其现实因素。在小说的第三部分，拉希德回忆了自己在英国的经历。在抵达英国不久后，拉希德发现家乡已经被暴力和恐惧所笼罩，回不去的家乡使他正式成为一个流亡者，他意识到“从今往后我都只能住在英格兰，做一个四顾茫然的异乡人”，这种异类感很快使他发生转变：

哈拉尔德·埃德黑姆在研究挪威北部西芬马克的挪威人与海岸拉普人的族群关系时提出：“交换资源成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在该领域里通过得体地扮演挪威人角色而掩饰拉普人角色，族群身份被忽略，交换得以产生。”（巴特, 2014, p. 44）失去家园，渴望融入新社会的拉希德也不得不抛弃了复杂的可能性，投身于黑白分明的“巨大谎言”。为了获取资源以便安身立命，他只能遵循社会规约被同化。除了为了获取社会资源，瓦妮莎·巴罗尔斯基（2008）提出“人权只有在我们是民族国家公民的时候才会成为我们作为人类应得的权力。”当拉希德失去了他的故乡后，这样一种边缘化的处境使他“很容易遭受到特别的暴力”。

从肯尼亚殖民地的历史到移民的历史现实，拉希德受挫的想象既有其历史根源也有其现实因素。罗歇·凯卢瓦在“文学的危机”中陈述道：“想象力不会像一个被带上前的主犯那样轻易坦白，即使饱受悔恨的折磨。无论如何，它的坦白对象，不是那些痴迷它的人，而是压制它的人。”（福柯等，

2016, p. 3) 而压制拉希德想象力的元凶,即为贯穿着历史与现实的“大写的一”。巴迪欧在对事件的界定中这样说到:“事件不是预先给定的,因为大写的体制就是全部给定物的法则。”(蓝江, 2018, p. 49) 在这里,“大写的一”除了黑格尔式的贯穿历史本身的真理,还是利奥塔意义上统摄整个社会,试图建立起可以支配所有话语体系的元叙事。拉希德本人深受其害的,不仅是其笔下伯顿和弗雷德里克所代表肯尼亚殖民历史中有关种族优越性的叙事,更是整个西方由德国唯心主义传统与法国大革命所形成的思辨机制与解放机制。

在对认知主体和实践主体的双重控制中,“大写的一”不仅决定了“真理是什么”,还决定了“谁有资格行动”。从“插叙”中屡屡停滞的想象到小说结尾的“后续”中带着肯尼亚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去参加学术会议,拉希德对“大写的一”的感触与反思越来越深入。电影《美国小说》(*American Fiction*)以极具讽刺的方式讲述了失意的小说家蒙克(Monk)用心创作文学作品无人问津,以开玩笑的方式创作了一本充斥着黑人刻板印象的小说却被广受追捧的魔幻现实。与蒙克不同的是,《遗弃》中的拉希德不是小说家,他殖民地文学研究者的身份使他能够洞悉本应代表着反思与革新的学术研究中存在的弊端。

在会议上,他提到了蕾哈娜和皮尔斯的故事并指出,在(后殖民)小说和部分回忆录中,“性经历的描写要么是缺失的,要么就被升华了,用来表现庇护者的痛苦,或体现为一种过度悲剧性的传闻。”(古尔纳, 2023, p.300) 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们总是倾向于高度概括以及总结,然而这必然导致了对现实的复杂性的牺牲。拉希德自身的经历,他所受的教育与他为了研究所做的对社会现实的感受与对历史事实的追寻中,一个个小写的人消失了,同样消逝是对复杂性的追求。在“插叙”中拉希德也对此进行了反思,最终他认为“我们宁愿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贪婪和欲望,也不愿相信,其实爱才是真正的动机。”(古尔纳, 2023, p.129) 在巴迪欧看来,在当今世界,“爱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其中之一便是在安全的名义下,通过各种理性的算计,把爱排除在偶然性之外。”(巴迪欧, 2012, p. 25) 在“插叙”中,拉希德不断想象却又不断受挫,在想象皮尔斯与蕾哈娜互通书信的情节时,他在疑惑中发问:“一个英国人,在那种地方如此显眼,是怎么找到方法做这些事的呢。”(古尔纳, 2023, p.134) 而即使他们的通信得以进行,“话又说回来,就算有办法做到,又到底是什么让马丁不顾一切地想要和蕾哈娜这样的女人展开恋情。”(古尔纳, 2023, p.135) 在肯尼亚殖民地,蕾哈娜与皮尔斯的爱情不仅仅有客观条件上的阻碍,受殖民、宗教等世俗规约影响之下形成的,带有偏见的主观的个人意识也不可能使爱情发生。蕾哈娜身为女性,“被一种关于女性贞操的道德焦虑牢牢钳制”,如果她敢逾矩,将收获“用嘲笑、羞辱和更为恶劣的手段。”(古尔纳, 2023, p.136) 而在皮尔斯那边,“帝国世界对性行为是否得体是有严格规定的”,作为传教士的皮尔斯需要考虑“舆论与尊严和对联交所一切商品价格的影响。”(古尔纳, 2023, p.136) 作为研究肯尼亚殖民文学的学者,在对殖民地双方历史详细考证的情况下,在他自己所处的,充斥着“种族化世界的僵化看法”的社会的影响下,拉希德的想象难以进行。而蕾哈娜与皮尔斯的爱情故事因其真实性,却不断地冲击着拉希德的认知:“...为什么当我开始构思(阿明与贾米拉故事)的时候,会不由得想象起贾米拉的外婆蕾哈娜和英国男人皮尔斯是如何相遇的,又是怎么在那个两人的世界是如此不同、如此遥远的年代走到一起。”(古尔纳, 2023, p.263)

因此,蕾哈娜与皮尔斯的爱情便成为了这样一个“事件”,被“大写的一”所抗拒、所排斥,却又无法被简化与概括,它以事件本身生成性的力量不断撕裂原有的秩序,影响着它的参与者与旁观

者们。在对蕾哈娜和皮尔斯故事的书写、搁笔、反思中，拉希德的主体意识逐渐摆脱了之前受困于黑白分明的谎言的状态，他逐渐意识到复杂的可能性的意义，以及整个社会乃至学术机构这个“大写的一”对思想的抹杀与对想象的钳制。作为创基性的爱之事件，“在事件发生那一刻，一部分存在物成为支配与主导新秩序的因素，而另一些存在物是被强制性地纳入创基的秩序之中，而在创基性的事件中，支配性因素和其他存在物被强制纳入一个创基性的源始事件之中。”（蓝江、刘黎，2017, p. 30）在《遗弃》中，蕾哈娜与皮尔斯以绝对的偶然性为基础的爱之事件正是这样一个创基性的源始事件，爱作为支配性因素与其他存在物被纳入其中，它抗拒着大写的一的逻辑，不断地制造着断裂，并以自身的生成性产生着全新的逻辑。

三、蕾哈娜与皮尔斯：创基性的爱之事件

创基性（Inceptuality）的概念来源于海德格尔，而与之紧密相连的就是事件本身。海德格尔说：“事件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起源的自明性的创基。存在的开创性的真理，在其自身中，作为创基的统一性，保留了支配与被支配之间始创的统一体。”（巴迪欧，2018, p. 30）在起源性的创基事件中，世界的一切或者对世界的理解被容纳入由事件所创生的新秩序中。在《遗弃》中，这个创基性事件就是蕾哈娜与皮尔斯的爱。蒂娜·斯坦纳曾评论道：“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暴力以及新非洲民族主义的排外话语的背景下，古尔纳坚持书写有关彼此产生联系时的微弱之声，肯定了其中包含的友善。”（Steiner, 2010, p. 125）蕾哈娜与皮尔斯的爱之事件正是跨越边界并产生联系时的“微弱之声”。但是，相比于古尔纳笔下众多来自不同族群和文化背景的人物彼此之间偶然联系不同的是，蕾哈娜与皮尔斯的爱之事件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偶然。蕾哈娜与皮尔斯之间有着宗教、种族、殖民、性别等不同方面的多重束缚，但却产生了具有排他性的爱之事件，超脱于拉希德的想象之外，作为一种纯粹的创造使其置身于一种全然陌生的境界中。正如创基在拉丁语中的含义为“我开始”一样，这种纯粹的偶然就是“无中生有”的过程。在巴迪欧这里，事件是纯粹内在性的，“作为再现（representation）的逻辑而言，根本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真实，那么真实的显现（presence）必然相对于再现存在着绝对溢出。”（巴迪欧，2018, p. 31）蕾哈娜与皮尔斯的爱之事件这个具有偶然性的绝对溢出就是巴迪欧“事件”的基础。与海德格尔不同，巴迪欧试图摆脱哲学套上诗学的牢笼，试图在康托尔集合论的基础上使哲学回归数学传统，为了解决无中生有的问题，他的答案是空集（ $\emptyset$ ）。根据策梅洛-弗兰克尔（Zermelo-Fraenkel）公理，对于任何一个集合来说，都存在着这个集合所有元素的集合，而同时空集是所有集合的元素，因此可以得出空集 $\emptyset$ 的幂集是 $\{\emptyset\}$ ， $\{\emptyset\}$ 并不是空集，而是带有一个元素的一元集，而 $\{\emptyset\}$ 的幂集又是 $\{\emptyset, \{\emptyset\}\}$ ， $\{\emptyset, \{\emptyset\}\}$ 的幂集为 $\{\emptyset, \{\emptyset\}, \{\emptyset, \{\emptyset\}\}$ ……以此类推，从而“无中生有”，以代表着不可能性的空集 $\emptyset$ 出发形成整个世界的架构。在这里，空集 $\emptyset$ 就是事件本身。

在《遗弃》中的肯尼亚殖民地，哈桑纳利、玛莉卡（哈桑纳利的妻子）、蕾哈娜可被看作归属于同一个集合 A，而弗雷德里克、伯顿、皮尔斯等人归属于集合 B。集合 A 中的元素彼此可以共存，且他们两两组成的新的集合，如{哈桑纳利，玛莉卡}，势必从属于集合 A，成为 A 的子集。在小说中，哈桑纳利和玛莉卡拥有相同的宗教文化背景，他们的结合无可非议，顺理成章，是一种不断被延续的正常逻辑，即巴迪欧所说的情势状态(etat de la situation)。但集合 A 与集合 B 之间却只能产生空集 $A \cap B = \emptyset$ ，A 与 B 之中任意元素之间也同样如此“玛莉卡 $\cap$ 弗雷德里克 = $\emptyset$ ”。A 与 B，包括它

们的任意子集之间，都没有结合的可能。而爱之事件的出现改变了同一集合中的惯常性力量（宗教、文化）所导致的常见结果，改变了子集出现的方式，蕾哈娜与皮尔斯的结合首次实现了来自两个不同集合的元素组成的集合 $\varphi=\{\text{蕾哈娜}, \text{皮尔斯}\}$ 。与其他子集不同的是，这个全新的集合 φ 无法被辨识，即它既无法从属于 A 也无法从属于 B。由于 A 与 B 之间只能产生空集 $\emptyset$ ，即 $A \cap B = \emptyset$ ，那么可以得出 $\varphi=\emptyset$ 的结论，即蕾哈娜与皮尔斯所产生的这一爱之事件本身，就是 A 与 B 之间形成的空集。正是由于 φ 本身的不可辨识，拉希德才陷入了对这一事件的怀疑；由于无法用其知识解释它，拉希德的想象因此断裂。但 φ 的存在无法抹去，其存在的事实不断困扰着拉希德，使其最终意识到这种“性经历的描写要么是缺失的，要么就被升华了，用来表现庇护者的痛苦，或体现为一种过度悲剧性的传闻。”（古尔纳, 2023, p. 300）只有弥补这种缺失，以一种过去被排除在外的全新逻辑，才能真正去理解事件性的集合 φ 的出现。

蕾哈娜与皮尔斯作为从属不同集合的两个元素，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天然的凝聚力，正是爱使不可能的集合 φ 得以出现。巴迪欧将爱看作真理的四个前提之一，“在爱中，两个个体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差异，这同时是人们能够呈现的最大差异之一；因为这是一种无限的差异，一种相遇，一种宣言，一种忠诚，从而最终能够把这种无限差异转变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存在。”（巴迪欧, 2012, p. 89） φ 因此以创基性的存在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逻辑，既非 A 也非 B，而是同时从属又区别于 A 与 B。蕾哈娜与皮尔斯通过彼此的目光和视角的交流从而不断地去重新体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成为“大写的二”（Deux）。巴迪欧在《存在与事件》中写道：

“因为名称是一个非再现的代位，事件仍然是匿名的和不确定的……事件维持了与不可展现之物的缝合。这是因为超一的本质是大二（Deux）……一个事件是一个间（intervalle），而不是一个项，它在介入的反作用下，在被位标明其边界的空的无名状态与名称的额外性之间建构了自身……大二并非对计数的一的复制，也不是对计数规则的结果的重复。这是一个原初性的大二，一个悬置的间，决定所产生的分裂的结果。”（巴迪欧, 2018, p. 258）

蕾哈娜和皮尔斯的爱之事件正是一个原初性的大二，一个超一，一个悬置的间。当拉希德在“插叙”中再度发问“究竟是什么，让有着这种背景的一个英国人——大学、殖民地官员、学者——和东非海边小城一个店主的姐姐开始了这样一段感情？”（古尔纳, 2023, p.136）这表明他所受到的教育、生长和生活环境所赋予他的文化身份已不再能够帮助他理解蕾哈娜与皮尔斯的爱之事实。蕾哈娜与皮尔斯革命性的合体所产生的不可能的集合 φ ，作为一个悬置的间，已然凌驾于 A 与 B 现有的规则与逻辑之上。在建构出有关二的真理时，不可辨识的集合 φ 的存在也在表明，只有来自不同集合的（至少）两个元素的合体而非单一元素，才能真正创生出爱之事件。而蕾哈娜与皮尔斯的爱之事件，在创造出分裂和引入全新的逻辑的同时，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阿明与贾米拉、拉希德与芭芭拉两个接续性的爱之事件的生成。

四、大写的二：真理秩序的初建

蕾哈娜与皮尔斯创基性的爱之事件不仅创造了全新的逻辑，形成了以超一存在的“大写的二”，在此基础上还直接和间接地促生了阿明与贾米拉，芭芭拉与拉希德的爱之事件。在回忆中，拉希德

写到,“我的哥哥阿明之所以知道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件事的后果也对他产生了影响,可他却不能和我说得太多。”(古尔纳, 2023, p.138) 蕾哈娜和皮尔斯的故事对阿明“产生了影响”,因为这导致了阿明与贾米拉爱之事件的发生;“可他却不能和我说得太多”,说明并不只有拉希德发生了想象的断裂,他的哥哥阿明同样受制于惯常性的逻辑,大写的一的黑白分明使他同样不能对这一事件进行完整描述。在阿明遇到贾米拉时,她因外婆蕾哈娜与欧洲人的“丑闻”与自己多次再婚的事实而遭人诟病,闲话缠身。在与贾米拉交往时,阿明虽然“觉得自己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却“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他与贾米拉的生活环境是一个被“大写的一”牢牢掌控的地方,“这不是一个可以容忍这种关系公开的地方,目不转睛、毫不松懈的监视,会把情侣们焦虑的密谋变成肮脏的笑话。总有人在捕风捉影,而各种碎片叠加在一起,迟早会暴露所有事情。”(古尔纳, 2023, p.217) 在爱之事件造成的绝对溢出威胁到“大写的一”时,大写的一通常会以强权的方式,彻底消灭这个真实的溢出。“...这种消灭是以他们真实存在的实体消亡来警告那些意欲有着同样行为的人不要重蹈覆辙。”(巴迪欧, 2018, p. 34) 在蕾哈娜与皮尔斯的爱之事件发生后,为了消除未来同样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在整个社会“全景敞视”式的监管下,贾米拉作为一个被公开惩罚的典例用来警示他人。但阿明与贾米拉最终仍然产生了爱情,革命性的合体再一次生成,“大写的一”的规训不能完全抹杀皮尔斯和蕾哈娜爱之事件存在的痕迹,也就是阿斯玛这个真实存在的实体。事实上,阿斯玛作为蕾哈娜和皮尔斯的女儿,贾米拉的母亲,其名字的含义为“无罪之人”。巴迪欧认为:孩子可以说是爱的空间之中的一个点。一个点,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基于这个点,事件得到重新把握,从而事件被重新演绎,在一种变化的形式下重新返回,从而迫使我们重新“宣布”(巴迪欧, 2012, p. 81)。“无罪之人”阿斯玛是蕾哈娜与皮尔斯的结晶,也是他们忠于“爱之事件”的又一宣言。

从蕾哈娜和皮尔斯到贾米拉与阿明,爱之事件看似失败了:两对眷侣最后都分道扬镳,集合 A 与 B 的惯常性逻辑、大写的一卷土重来。但爱之事件的意义不在于其结果,而在于其难以磨灭的存在本身。爱在生命中发明了另一种不同的持续的方式:“在爱的体验中,每一个人的存在,都将面对一种全新的时间性。”(巴迪欧, 2012, p. 64) 可以说,拉希德同时受到了蕾哈娜和皮尔斯与哥哥阿明与贾米拉的两个爱之事件的影响。在试图记录哥哥阿明的故事时,他发现自己“会不由得想象起贾米拉的外婆蕾哈娜和英国男人皮尔斯是如何相遇的”,“如果不去想象蕾哈娜和马丁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我就没办法动笔。”(古尔纳, 2023, p.138) 这也反证了两个事件彼此具有相同的逻辑,而拉希德如果不能突破惯常性的逻辑所带来的束缚,那他将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这两个事件,断裂的想象也将永远断裂。

在小说的最后,拉希德与皮尔斯的孙女芭芭拉走在了一起,在踏上寻找过去的旅程后,他以一种戏谑的口吻对芭芭拉说:“我得写信解释一下你要去,免得爸措手不及。而且咱们得分房睡,你知道的。”两人说罢后都笑了起来,只因“这句话在我们这个年龄体现出来的喜剧意味。”(古尔纳, 2023, p.304) 一方面,这句话体现了大写的一残余但仍然有力的影响。从蕾哈娜和皮尔斯到拉希德的时代,波卡洪塔斯与风中奇缘之类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然而正如拉希德来到英国后的遭遇一般,整个社会仍然“黑白分明”,传统观念仍然深植;在另一方面,在类似蕾哈娜和皮尔斯的爱之事件的冲击下,在对其不断的反思中,拉希德心中的枷锁已被冲破。虽然他仍然无法对这一事件进行完整的想象,但能以一种反讽的态度,在调侃中揭露这种古老的隔离观念的荒谬性。

从小说的开始到结束,蕾哈娜与皮尔斯爱之事件始终没有被完整地叙述,但其创基性的存在本

身却不断地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大写的一”的逻辑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也逐渐被弱化。

“一种真正的爱,是一种持之以恒的胜利,不断地跨越空间、时间、世界所造成的障碍。”(巴迪欧, 2012, p. 63)从蕾哈娜与皮尔斯到拉希德与芭芭拉,爱之事件以晦暗不明的方式出现,并以其存在本身而非结果,跨越时间和空间产生着源源不断的影响。巴迪欧认为爱之中有着某种过渡的经验,从而可以由纯粹的偶然的个别性过渡到某种具有普遍价值的因素。在皮尔斯和蕾哈娜那里,创基性的爱得以发生,并以其生成性的力量不断地创造。在蕾哈娜的女儿阿斯玛和孙辈贾米拉那里,这种爱被传承下来,使她和阿明能够冲破世俗的束缚走在一起。阿明与贾米拉的爱情重申并巩固了这种爱。同时,这种爱令拉希德困惑,却又使他在受挫的想象中不断地冲撞,最终得以一窥“大写的一”对他的钳制,并在对整个学术体制的反思中重获自身的主体性,使他最终迈出朝向芭芭拉爱的一步。爱又一次在拉希德的行动中取得了其现实性,它从皮尔斯和蕾哈娜那里作为“偶然”开始,在一次又一次新的宣言中被“固定”。

皮尔斯和蕾哈娜创基性的爱之事件导致了阿明与贾米拉爱情的发生,两个互相联系却又独立的爱之事件在拉希德这里被重新巩固,生发出拉希德自身的第三个爱之事件。正如巴迪欧所言:“爱的思想的秘密,就在于这种最终完成‘爱’所经历的绵延岁月,偶然的个别性爱之事件也因此获得了普遍的价值。”(巴迪欧, 2012, p. 63)而这种跨越边界的事件,也是古尔纳所有作品中重点叙述的对象,比如《天堂》中优素福在贸易途中见证的不同种族之间的交流,《来世》里哈姆扎与德国长官的温情时刻。而“拒绝承认他人具有人性以及这种否认所带来的可怕后果是古尔纳小说的核心所在,在这里,彼此之间的敌意和善意之间经过精心勾勒的并置,昭示着彼此间的联系成为一种可能的替代空间。”(Steiner, 2010, p. 126)在这些不可被常理解释的关系中,人们放弃了单一的主客体关系,转向一种可以对话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使之成为自由可能存在的时刻。

爱之事件正是古尔纳笔下这些跨越边界的事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相对于不断重复的同一性(身份)崇拜,必须用不断差异、无法重复的爱来加以反对。”(巴迪欧, 2012, p. 128)而爱之所以成为事件,同样源于革命性合体中两者的绝对差异性,其影响也需在后续不断衍生的事件中作为对爱之宣言的重述进行从偶然到普遍的逐渐过渡。因此,拉希德与芭芭拉的结合这一事实,如同蕾哈娜和皮尔斯的故事一样,最终成为彼此影响,交相辉映的爱之事件的一部分,“在忠于事件的基础上,给予新的计数为一的方式,让处于空位的事件点之上的溢出得以在新的命名下重新被结构化。”

(巴迪欧, 2017, p. 8)爱让无名之多元降临于世,或者说,让关于性差异的类性或真理降临,这个真理明显地是从知识中抽离的,尤其是从彼此相爱的两人的所知中抽离的。“宣布爱情,也就是由相遇事件慢慢过渡到某种真理的建构过程的开端。”(巴迪欧, 2014, p. 58)阿明和贾米拉、拉希德与芭芭拉的故事作为忠于创基性爱之事件的宣言,在一个长期的、分散的、令人困惑和迷雾重重的过程中,完成了“从偶然到一种坚定的建构。”(巴迪欧, 2012, p. 76)

五、结语

蕾哈娜和皮尔斯的爱情这一事实无法消弭这一事件本身的神秘性,而事件本身不可被穷尽的性质也正是它生成性力量的源泉。《遗弃》中源始性的爱之事件与其跨越时间与空间促生的其他事件彼此独立又互为补充,如同同时落入水中的石子,彼此的波纹互相碰撞回荡,余波不绝。“在爱之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时代不可辨识之物的光芒的降临。”(巴迪欧, 2018, p. 24)从一种晦暗不明的

事件开始，皮尔斯和蕾哈娜的故事跨越了时间与空间。以两人相遇开始的爱之事件从阿明、贾米拉又辗转到达希德，创基性的爱之事件不断在爱之宣言的重申中获得其现实性。巴迪欧借用马拉美对诗歌的表述来言说爱，“偶然应该被固定”，诗歌和爱一样都在于发出一种话语，这种话语能够在生活之中产生无限的实践效果。从征服言语到征服现实，偶然性的爱之事件在不断的重申中被固定，它具有生成性的力量不断冲散大写的一，创造出以“两”的体验为基础的真理。两个主体一同融入这唯一的爱的主体，“透过其差异性，世界来临，世界诞生，而不再只是填满我们的视线。”（巴迪欧，2012, p. 55）从一种偶然到一种坚定的建构，这种偶然转变为一种命运。“它既不可能是一个已知的或已被认识的多，也不是一种玄妙莫测的独特之物，而是在其多之存在中获得了集体的共同属性的东西。”（巴迪欧，2018, p. 24）从蕾哈娜与皮尔斯，再到阿明与贾米拉，最后至拉希德与芭芭拉，从作为呈现的一到作为呈现的体制的多，新的秩序在爱的宣言之重申与爱的事件之“纯多”中被建立。爱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集体存在的真理，以事件为媒介在其制造的断裂与生成中不断阐明自身。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基金社科项目“新南非英语小说空间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BWW06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异识视域下古尔纳后殖民书写中的创伤与文化记忆研究”（项目编号：2023lzjbkyxs02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Hao Wenxua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0-0246-6208>

References

巴特（2014）：《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商务印书馆。

[Bart, F. (2014).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trans. Li Liqin. The Commercial Press.]

巴迪欧（2012）：《爱的多重奏》，邓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Badiou, A. (2012). *In Praise of Love*, trans. Deng Ga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2014): 《哲学宣言》，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14). *Manifesto for Philosophy*, trans. Lan Jia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2017): 《世纪》，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17). *The Century*, trans. Lan Jia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2018): 《存在与事件》，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18). *Being and Event*, trans. Lan Jia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福柯等：（2016）：《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赵子龙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Foucault, M., et al. (2016). *Words are Trash: Literature after the Crisis*, trans. Zhao Zilong, et al.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古尔纳（2023）：《遗弃》，孙灿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Gurnah, A. (2023). *Desertion*, trans. Sun Can.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希尔顿 (2021): 《非洲通史》, 赵俊译。九州出版社。

[Shilington, K. (2021). *History of Africa*, trans. Zhao Jun. iuzhou Press.]

霍赫希尔德 (2018): 《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 贪婪、恐惧、英雄主义与比利时的非洲殖民地》, 扈喜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Hochschild, A. (2018). *King Leopold's Ghost: A Story of Greed, Terror, and Heroism in Colonial Africa*, trans. Hu Xil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蓝江 (2018): 《忠实于事件本身: 巴迪欧哲学思想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Lan Jiang (2018). *Loyalty to Event Itself: An Introduction to Badiou's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蓝江、刘黎 (2017): “作为真理前提的爱——巴迪欧的爱之事件”, 《苏州大学学报》(04): 28-35.

[Lan Jiang, Liu Li (2017). “Love as the Premise of Truth: Badiou's Event of Love.”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04):28-35.]

Barolsky, V. (2008, May 18). Freedom's just another word. *Sunday Independent* [South Africa].

Steiner, T. (2010). Writing “Wider Worlds”: The Role of Relation in Abdulrazak Gurnah's Fiction.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 (03), 124-135.